

(為澳門博物館導賞員講課文稿)

澳門的國際貿易和中國風

徐新 (澳門博物館研究員)

*澳門開埠的重大歷史意義

自 1553-1557 年澳門開埠以後，貿易的發展使它在世界貿易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成為世界遠東地區最早最大的貿易中心。而當時的日本、菲律賓等國家和地區，也通過澳門作為貿易中轉港而同世界各地建立貿易往來關係。從 16 世紀 80 年代起到 17 世紀 40 年代，澳門早期的轉口貿易達到了高峰。當時作為世界強國的葡萄牙，其商人入居澳門之後，即以此為據點，竭力拓展澳門同印度的果阿、日本的長崎、菲律賓的馬尼拉以及同歐美等國家的貿易。澳門一時成為聯繫亞洲、歐洲、美洲 3 條航線的中心港口，成為中國內地對外貿易的外港，同時又是中國與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日本、東南亞、英國、法國、德國、美國、古巴、秘魯等國家和地區貿易的重要中繼港。“全球化”從夢想變成現實。

*國際貿易規模的革命性改變

葡萄牙人發現新航路後，特別是澳門的開埠，使國際航運效率提高，中國海外貿易規模越來越大，為過去中外貿易所望塵莫及。在羅馬帝國時代，自漢帝國運往西方的絲綢，沿著歐、亞大陸的絲綢之路來運輸，要經過長距離的沙漠、草原和高山。一支三十匹駱駝的駱駝隊，只能馱九噸，行走速度緩慢，運輸效率非常低下。經過長途跋涉，運到歐洲的絲綢，數量不大，貿易額自然有限。可是，到了十六、七世紀之交，自澳門駛往印度果阿的葡國商船，每艘載運白絲千擔、綢緞一萬至一萬二千匹及大量的各種色細絲，再加上其他貨物，數量當然要比絲綢之路的貿易大得多。由菲律賓開往美洲的大帆船，每艘載重數百噸至二千噸，有“絲船”之稱，因為船中載運貨物，以中國絲貨的價值為最大。①革命是什麼？革命就是解放生產力，“海上絲綢之路”是國際貿易規模的革命。

一、 國際貿易樞紐

16 世紀 70 年代至 17 世紀 40 年代期間，到澳門經商的葡萄牙人與華人聯合首先建立起澳門—果阿—里斯本、澳門—長崎、澳門—馬尼拉—墨西哥等三條貿易航線，編織成以澳門為中轉樞紐港，以里斯本為財富歸宿地的國際貿易大三角網絡。澳門因此成為名揚海外的國際貿易中心。

1. 澳門—果阿—里斯本航線。這是澳門早期最重要的對外貿易航線。葡萄牙人使用載重量 600-1600 噸的大帆船，把中國豐富的貨物運往印度果阿，再轉道里斯本和歐洲各國，然後把歐洲各國和印度的貨物運往澳門進行貿易。當時從澳門輸出的貨物主要有白絲、綢緞、絲線、黃銅、瓷器、漆器、茯苓等土特產品 20 多種，其中以生絲為最大宗。據統計，明萬曆八年至十八年(1580-1590 年)，澳門每年運往果阿的生絲有 3000 餘擔，價值銀 24 萬兩；崇禎八年(1635 年)達到 6000 擔，價值銀達 48 萬

兩。而歐洲經果阿運往澳門的貨物有白銀、蘇木、象牙、檀香等，其中以白銀為最大宗。明萬曆十三至十九年(1585-1591 年)，運進澳門的白銀約 90 萬兩。這些白銀由葡萄牙人從墨西哥、秘魯運回里斯本後，再轉運到澳門。

2. 澳門—長崎航線。明嘉靖年間，由於日本豐臣秀吉侵略朝鮮以及倭寇侵擾，明政府嚴格實行海禁，不准中國商民同日本貿易，但葡萄牙人在澳門不受此禁令的限制，這使澳門與日本長崎的貿易繼續發展。當時，澳門運往長崎的貨物主要有：白絲、紅木、鉛、錫、金、棉線、棉布及一些中國土特產品。據記載，明萬曆二十八年(1600 年)左右的一艘葡萄牙商船運往長崎的貨物有：白絲 600 擔、白鉛 500 擔、金 3000-4000 兩、水銀 150-200 擔、錫 500-600 擔、糖 210-270 擔、棉線 200-300 擔、棉布 3000 匹、麝香 2 擔、茯苓 500-600 擔、大黃 100 擔、甘草 150 擔，綢緞 1700-2000 匹、共價值銀 13.766 萬兩，又 9016 西班牙元。從長崎運回澳門的貨物主要是銀子及珍異品。據統計，從萬曆十三年至崇禎三年(1585-1630 年)，由長崎運往澳門的銀子達 1489.9 萬兩。

當時的日本，則主要是依賴澳門同世界交往，日本所需物資主要是通過澳門而獲得的。中國的絲織品，如綢、緞之類，葡船也由澳門大量運往日本出售，而在澳門、長崎之間從事貿易的葡國商人，把日本出產的大量運往澳門，用來購買輸往日本的中國物資。

3. 澳門—馬尼拉—墨西哥航線。1565 年，“征服”菲律賓群島的西班牙船隻聖巴勃羅號從菲律賓返回美洲，從而開闢了墨西哥與菲律賓(即美洲與亞洲)之間的航線。1580 年，葡萄牙被西班牙兼併，按西葡八項和平條款“規定葡人有權與西屬馬尼拉自由通航、通商”。西班牙為了籠絡人心，明確規定向馬尼拉輸入的中國商品，必須經由澳門裝運，以此來保障澳門在遠東貿易的壟斷地位。於是澳門—馬尼拉—墨西哥貿易航線得以形成。當時從澳門運往馬尼拉的商品有生絲、絲織品、瓷器、鐵鍋、銅、鐵、水銀、棉布、彈藥、寶石等 40 多種，數量也很大。如崇禎三年(1630 年)以後，澳門輸往馬尼拉的貨物的總價值平均每年為 150 萬兩西班牙銀元，折合中國銀約 100 萬兩。其中以生絲為最大宗。由馬尼拉運回澳門的貨物主要是白銀、蘇木、蜂蜡及墨西哥洋紅等，其中以白銀為最多。明萬曆十五年至崇禎十三年(1587-1640 年)，運進澳門的銀達 2025 萬兩西班牙元，佔貿易總額的 68.9%。②至於澳門與墨西哥之間的貿易往來，則以馬尼拉為橋樑，當時駛往墨西哥的馬尼拉大帆船，其裝載的貨物中有 90% 以上是中國貨，最主要的是生絲和絲織品，有時多至 1200 箱。所以被稱為“絲綢之船”，又因它是航行在太平洋上的新航線，人們就稱這條航路為“太平洋上的絲綢之路”。中國絲綢等商品從澳門(包括從福建月港)航運到馬尼拉，再由馬尼拉大船運至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港。

到 18 世紀末，在墨西哥進口總值中，中國絲綢等商品就佔 63%。大帆船從墨西哥返航時，又運載白銀(銀元)和其他貨物返回馬尼拉。然後，再轉運到中國澳門和福建月港。據估計從 1656-1820 年之間，墨西哥向馬尼拉輸送的白銀達四億比索，絕大部份分流入中國。德國著名經濟學家貢德·弗蘭克在他的著

作《白銀資本》中記載：“美洲在 17 世紀和 18 世紀分別生產了 37,000 噸和 75,000 噸，各有 27,000 噸和 54,000 噸運到歐洲，兩個世紀合計 81,000 噸。在歐洲獲得的白銀中，大約一半(39,000 噸)又轉手到亞洲，其中 17 世紀為 13,000 噸，18 世紀為 26,000 噸。這些白銀最終主要流入中國。另外，有 3,000 噸到 10,000 噸，甚至可能高達 25,000 噸白銀是從美洲直接通過太平洋運到亞洲；而這些白銀的絕大多數也最終流入中國。此外，日本至少生產了 9,000 噸白銀，也被中國所吸收。因此，在 1800 年以前的兩個半世紀裡，中國最終從歐洲和日本獲得了近 48,000 噸白銀，可能還通過馬尼拉獲得了 10,000 噸甚至更多的白銀，另外還從亞洲大陸上的東南亞和中亞地區以及中國自身獲得一些白銀。這些加起來，中國獲得了大約 60,000 噸白銀，大概佔世界有記錄的白銀產量(自 1600 年起為 120,000 噸，自 1545 年起為 137,000 噸)的一半^③，白銀流入中國的過程中，澳門作出了最大的貢獻。

從上述國際貿易的史實可以看出，早在明代後期的 80 多年中，澳門的對外貿易發展是迅速和繁榮的，而且起著溝通亞、歐、美三大洲的作用，成為當時國際貿易的一個重要中繼港和名副其實的國際貿易中心。居住在澳門的葡萄牙等外國商人從每年一月開始，向中國商人採購計劃銷往馬尼拉、印度和歐洲等地的貨物；從六月開始採購銷往日本的貨物。這樣就可以在西南季風和東北季風季節用帆船乘風發運，獲取中國商品在日本、印度、東南亞、歐洲及美洲等地所產生的物以稀為貴的巨額利潤。在葡萄牙商人通過澳門中轉貿易獲取巨額利潤與財富的同時，中國官商各界也從中分享到海外貿易的好處。由於澳門外商需要用白銀採購中國商品，販運出口，澳門成為洋銀向中國與外商諸家分流的集散地。

“銀子不是萬能的，但是沒有銀子却是萬萬不能的！”賺到了錢，有了銀子，歐洲各國商人都熱衷於在澳門購買中國的工藝品和奢侈品回家。經濟是基礎，澳門的國際貿易帶動了中國文化藝術的對外傳播。

二、 兩種截然不同的心態

北京紫禁城裡有一個養心殿，我去過不下一百次，我在北京學習工作整整二十年，讀大學時到紫禁城次數最多，因為中央直屬藝術院校的學生憑學生證就可以免費進故宮、北海、頤和園和博物館。我每次在養心殿駐足，就想“養心殿”這個名字取得真好！可是皇帝的心就在這個閉塞的環境裡養成，“真可悲！”關門做皇帝“閉關自守”扭曲了心靈，就產了不思進取的心態，天朝上國的心態。

在鴉片戰爭之前，在中國皇帝眼裡，中國是天朝上國，其餘國家都是番邦夷狄之人，外國使節來華都是前來“朝貢”的，所携禮物都是“貢物”，國書猶如番臣的奏表。理藩院在處理這些外交禮節時，也是一廂情願地這麼去做。

1793 年，清朝政府接見了一個龐大外國使團，這就是英國國王喬治三世派遣馬戛爾尼率領的訪華團。18 世紀末的英國，資本主義發展十分迅速，中英貿易的增長也很快，此時的中英貿易額達 1000 萬兩以上，佔整個中西海上貿易總額的 80% 左右。馬戛爾尼此行的任務表面上是補祝乾隆皇帝 80 大壽，實際上是

爲了擴大對華商務，要求派使臣長駐北京，准許英商登岸貿易，要求按澳門模式在舟山租一小島給英商收存貨物和居留，等等。英國使團的船隊 1792 年 9 月離開英國，次年 7 月駛抵天津大沽。乾隆和中國官員對於英國人不遠數萬里前來祝壽當然感到高興，但是，在他們眼中，大英帝國的特使不過是番國的“貢使”，英文國書《英國國王喬治三世致中國皇帝書》被譯成《英吉利國王熱沃爾日敬奏中國大皇帝萬萬歲》的朝貢表文，護送使團的車船上也插著“英吉利貢使”的小旗。

馬戛爾尼特使和他的使團，與朝鮮、安南（今越南）等等屬國的使臣一樣，已經糊里糊塗地作了皇皇天朝的升平道具和臨時演員。只不過由於龐大的使團和相應的歡迎儀式，使這一“四方朝貢”的盛事更具氣氛罷了。當乾隆皇帝接見英國使節前夕，中英雙方馬上爲禮節問題發生了爭執。中國官員堅持要英使行三跪九叩之禮，而馬戛爾尼清醒過來則斷然拒絕。幾經商量，最後的妥協方案是用謁見英王時最恭敬的禮節謁見乾隆，即免冠以單腿下跪，但免去吻手。這樣才使 1793 年 9 月 14 日，乾隆在熱河行宮接見英國使團的儀式得以順利進行。馬戛爾尼訪華過程始終是沉悶的，每天面對那些“思想僵化，面目可憎”的大清國官僚，真可謂“悶到死”！唯一有趣味的是馬戛爾尼使團中有一個 13 歲的英國小孩斯當東，他會說幾句中國話，他在乾隆皇帝接見時，用不咸不淡的普通話，與乾隆皇帝對話，使皇帝龍顏大喜，從腰裡解下自己的檳榔荷包（上面綉有五爪金龍）送給這個“小洋鬼子”。但是，對於英國人進一步的通商要求，乾隆皇帝一口回絕，在給英王的敕書中，乾隆傲慢狂妄地表示，“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如果英商來華貿易不遵中國法制，“定當立時驅逐出洋”。馬戛爾尼的訪華沒達到預定的目的，於 1794 年離開廣州回國。事後東印度公司一個職員評論說：馬戛爾尼一行受到了“最禮貌的迎接，最殷切的接待，最嚴密的監視，最文明的驅逐。”

馬戛爾尼使團帶到中國的五百九十餘箱禮品是這次訪華活動中“含金量最高”，代表了當時歐洲資本主義文明的最高成果，遭到大清國皇帝、大臣們有意無意的封鎖和貶低。這批禮品包括：“天體運行儀、地球儀，英國最大的，裝備大口徑火炮 110 門的戰艦模型，有最新式的兵器：榴彈炮、迫擊炮、卡賓槍、步槍、連發手槍，還有赫歇爾望遠鏡、秒錶、韋奇伍德瓷器、帕克透鏡，布料和最實用的機器……禮品中最後的部份是油畫：英國皇帝成員和著名人士的肖像、城市、教堂、城堡、橋樑、陸戰、海戰、船塢、賽馬等真實寫生畫。”這批將近六百箱的禮品涵蓋了歐洲最先進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全部陳列出來可以佈置成爲世界博覽會的英國館，如果開放讓中國民眾參觀學習，也許在 18-19 世紀的中國會掀起一股“英國風”，可惜昏庸的大清國皇帝和大臣們沒有這個膽識和魄力，相反他們把這些文明的成果部份在圓明園作了幾天象徵性的展示後就裝箱打入冷宮，鎖進倉庫。他們以爲閉關鎖國可以鎖住中國人的心，就可以使中國人俯首貼耳接受他們的奴役和愚弄。直到二百年後，在上海舉行了世界博覽會，中國人被封鎖的目光才全面解放。

20 多年後，英國又派出阿美士德爲大使來華，企圖進一步開闢中國市場。這一回又一次在謁見皇帝的禮儀上發生了沖突。本來英國政府曾指示阿美士德爲達到出使目的可以相機行事，不妨順從清政府的要求謁見皇帝，但是東印度

公司董事會則堅決反對行磕頭叩跪之禮，阿美士德接受了東印度公司的意見，拒絕按照三跪九叩的禮儀謁見皇帝。嘉慶帝比他的父親乾隆皇帝更顛頑，更加剛愎自用，他一怒之下，下令立即遣送使臣回國，並且諭令今後英國不必再遣使來華。中英在謁見禮節上的這些衝突，一方面反映了清朝政府對西方勢力介入的戒備與敵視，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大清國皇帝的妄自尊大和對世界形勢的茫然無知。馬戛爾尼離開中國 80 年後，清政府才“醒”過來，開始向西方派留學生，但為時已晚。大清帝王的心態，決定了國運衰敗，直到辛亥革命，被人民推翻。

與清朝政府對西方的無知相反，17、18 世紀的歐洲卻掀起了一股中國熱，無論是在歐洲大陸，還是英倫三島，朝野上下，王公貴族和知識分子都以談論中國為時髦。這是一個朝氣蓬勃，積極進取的健康心態。

如果說 16 世紀西方關於中國的知識還很不完整，那麼由於大批傳教士經澳門進入中國，他們穿梭往返於中國與歐洲之間，由於那些訪華使團寫的出使報告附上精美的插圖在歐洲一版再版，17、18 世紀歐洲於中國的圖書長期暢銷不衰，西洋人對神秘富饒的中國充滿了好奇和美麗的想像。

從利瑪竇的《中國札記》開始，到曾德昭的《中華帝國史》、衛匡國的《鞞鞞戰記》，特別是在巴黎出版的《耶穌會士通訊集》和《北京耶穌會士中國報告》兩部大書，把一個歷史的和現實的中國推到了歐洲人的面前。但是當時最受讀者歡迎的是那些未到達中國的東方學家的編纂物，除了提到的門多薩《大中華帝國史》(1585 年)一版再版外，17 世紀中葉基爾謝(A.Kircher, 1602-1680)的《中國圖誌》和 18 世紀杜哈德(J.B.duHade)的《中華帝國詳誌》都是關於中國的百科全書式作品，在歐洲具有廣泛的影響。

1698 年第一艘法國船“昂菲德里特”號來華，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1701 年它第二次東行。兩次遠航從中國運去大量包括漆器在內的工藝品，中國精美的漆器、瓷器和精美的工藝品受到歐洲人的普遍喜愛，法語因之把漆器稱為“昂菲德里特”(Amphritiyite)。一時間穿絲綢衣服、擺設中國瓷器和漆器成為法國流行的風尚。不久歐洲人便開始仿製漆器。18 世紀初法國已經能夠仿製相當精緻的漆器。法國國王路易十五的情人蓬巴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是著名的漆器愛好者。1752 年她為蓓拉孚宮定購了大批漆器畫。法國馬丹(Martin)家族以製造漆器聞名於全歐洲，伏爾泰曾寫詩讚美他們的漆器。18 世紀中葉以後，愛好漆器的風尚也傳入德國。德國藝術家施托帕瓦塞爾(Jahann Heirich Stobwasser)開始出售漆器，上面繪製中國的人物和風景。他在不倫瑞克成立了一家漆器廠，生產上漆的鼻煙壺。

由於歐洲貴族熱愛中國瓷器的風氣加上中國瓷器高昂的接近天文數字的價格，推動了歐洲對製瓷業的探索。但是相當長的時間內，歐洲人始終沒有“破解中國瓷器製作的密碼”。潔白、明亮、半透明和釉彩精緻的中國瓷器，使整個歐洲傾倒。為此，一位法國傳教士在中國瓷器之都——江西景德鎮，“潛伏”了整整七年。

幾乎整個 18 世紀，中國的瓷器製作工序依然是一個嚴守著的秘密，它不僅是國家機密，也是家庭機密。中國人不但對外保密，對內也保密，中國家庭作坊歷來是傳男不傳女的，怕女兒出嫁後，“祖傳秘方”商業機密流失，家庭作坊的優勢被女婿家搶走，所以中國重視保守機密。甚至德國人貝特格發現了如何製造硬質瓷後，歐洲對中國瓷器的探索仍沒有停止過。特別是在法國，作了更大努力。它認識到玻璃瓷畢竟和神秘的中國瓷是兩種不同的東西。從中國本身的情報，其中包括(在中國的)耶穌傳教士佩雷·佛朗哥·澤維爾·昂特雷科萊(Pere Francois Xavier D'Entrecolles)於 1712 年寄到巴黎的來信(此信於 1716 年公佈在《專家》雜誌上)，鼓舞了從事這項試驗的人，這位傳教士在信中描述了景德鎮工廠瓷器的製作，他成爲歷史上第一個破譯“中國瓷器製作密碼”的外國人。

法國傳教士佩雷·昂特雷科萊，(漢名殷宏緒)，是清朝康熙年間由法國耶穌教會派來中國的，在景德鎮居住了七年，在傳播天主教的同時，傾全力收集景德鎮製瓷技藝的情報。1712 年 9 月對景德鎮的製瓷原料和景德鎮製瓷製作，包括從原料的選擇提煉、配製、成型、彩飾、燒煉等在內的整套製瓷工藝過程，作了具體而細緻的描述。1722 年 1 月 25 日，他從景德鎮寄到法國的第二封信，又對景德鎮製瓷工藝流程作了更爲具體的補充。製造瓷器的重要原料——高岭土的知識，是由昂特雷科萊第一次介紹到西方。公元 1771 年，法國里摩日附近發現高岭土礦後，法國才開始硬質瓷的製造，里摩日亦成爲現今著名的法國瓷城。從法國傳教士殷宏緒在景德鎮“潛伏”，到法國開始製造真正的瓷器，法國人用了六十多年。他們的執著、鑽研和鍥而不舍精神終於有了回報。這就是 18 世紀歐洲人的心態，值得中國人學習。

法國傳教士在中國收集製瓷技藝的情報，直接推動了歐洲本地製瓷業的發展，歐洲製瓷工匠也仿製中國瓷像的羅漢、漁夫、仕女、壽星公和道教神仙，頗具中國情調，十分傳神。

1986 年 10 月，江西陶瓷公司派員出訪法國瓷城里摩日時，法國庫達美窯爐公司總經理約·庫達特地贈與一本內有昂特雷科萊描述景德鎮製瓷技藝信件摘要的法文版《里摩日瓷器史》給中國來訪者，並說：“二百七十年前，昂特雷科萊把耶穌教傳到景德鎮，同時，又把景德鎮的製瓷技藝帶回到法國，他既是宗教的傳播者，又是瓷器的傳播者④”。

這次展覽的《巴克勒公爵花瓶》，清朝嘉慶年製陶瓷(1796-1820)，法式鍍金銅座(約 1815)。這套鑲有法式鍍金銅座的中國雙耳陶瓷花瓶組合產於帝國時代，展現了藝術家極其優秀的工藝，花瓶魁偉的體積，細緻將繪圖裝飾以及吉祥寓意，使其成爲稀世極品。花瓶高四呎，當今世上，已知與這組擁有同等史齡和尺吋的四尊配對花瓶組合絕對碩果僅存。四尊花瓶從沒因爲鑲嵌銅座而被動分毫，瓶身完好無缺，令其中西合璧的整體藝術價值尤被推崇。

這四個大花瓶陳列在澳門永利渡假村的大廳裡顯示了既熱愛由中國文化，同時也是一種炫耀的心態。

三、中國風引發洛可可藝術共鳴

17、18 世紀歐洲啓蒙運動期間，在哲學與社會思想衝破宗教神學束縛和專制主義桎梏的同時，歐洲的藝術也嚮往個性解放，表現在藝術風格上就是從巴洛克風格向洛可可風格的演變。而在這一藝術形式與風格的遞嬗中，中國工藝品的藝術魅力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從 17 世紀中葉起，中國的絲織品、瓷器、漆器、屏風、家具、壁紙、扇子等大量地經澳門運入歐洲各國，爲上層人士所喜愛。中國藝術品的淡雅之美很快在洛可可藝術興起的中心法國產生共鳴。

“洛可可”一詞是法語“Rococo”的音譯。在藝術史上，洛可可則專指一種興起於法國 18 世紀、深受享樂主義影響並爲封建貴族服務的藝術風格。在漫長的歲月中，法國成熟的封建制度逐漸培養了一種成熟的宮廷文化。其表現是：圍繞國王的宮廷形成了一個最受欽佩、最有教養的貴族階層，他們的社交禮儀成爲歐洲上流社會效法的榜樣，其生活的優雅、娛樂的高尚、文體的優美和思想的細膩都發展到極致。洛可可藝術即是這種宮廷文化在美術上的表現。路易十五時代，包括建築、雕塑、繪畫、室內裝飾等在內的洛可可藝術盛行一時，並影響到歐洲各國。它極力表現女性的優雅和柔美，追求輕盈、纖巧的風格，趣味甜俗，充滿了脂粉氣和享樂主義的傾向。

就繪畫而言，洛可可風格的作品都和宮廷貴族生活有關，而且多爲國王與貴族不同形式的肖像畫。它們以輕巧、華麗、精緻和細膩爲特徵，其表現手法沒有巴洛克式的顯著、強烈的明暗對比，而是給人一種輕快的感覺——色彩上喜歡採用銀色、不鮮明的金黃色、白色等輕淡、穩靜、雅致的色彩，畫面線條則使用柔和的曲線，不似巴洛克繪畫那樣曲折、誇張^⑤。

洛可可風格不主張刻板規整劃一的藝術模式，中國花鳥紋樣的自由舒展正好投其所好，並被用來取代那種整齊對稱的幾何圖案。法國畫家華托(Watteau)是 18 世紀初期法國畫壇上的一位天才畫家。其作品早期多表現下層平民生活。後期則非常喜歡描寫貴族青年男女們在田野和庭園裏談情說愛、尋歡作樂的場面。爲此，他獲得了“風流畫家”的綽號。華托善於以理性駕馭感覺，塑造纖弱苗條的女性形象，其最著名的代表作是《發舟西苔島》。在色彩上華托更是獨樹一幟，他的作品常常使用半透明的暖色調，背景多是大片暗色，在關鍵的造型外閃爍著金黃、玫瑰、天藍、銀白等耀眼的色澤，從而創造出一種朦朧的詩意氣氛和華麗的高貴感覺。華托的這些畫作爲同時代的洛可可畫家提供了範本，給洛可可繪畫藝術的產生奠定了基礎。華托的作品喜用淡雅的色調，輕淺的行雲和純樸的山景構成煙霧迷蒙的畫面，有一種幽雅、清新的韻致，頗似宋人的山水畫。

中國藝術的影響更多地是表現在中國題材上，畫家布歇(Boucher 1703-1770)在 18 世紀的法國畫壇享有盛譽，他以極其豐富的想像力和巨大的創造力成爲洛可可繪畫藝術的第一流大師和最典型的代表。布歇出生於巴黎的一個版畫家的家庭。在父輩的熏陶下，他從小就對繪畫產生了強烈的興趣。少年時，布歇師從著名的洛可可畫家魯莫奧斯學畫。1723 年獲得羅馬獎。1727 年至 1730 年遊

學意大利。32 歲時，布歇當選為皇家美術學院院士，從此經常出入貴族沙龍，深得法國國王路易十五的情婦、巴黎風流才女蓬巴杜夫人的賞識。18 世紀中期，布歇獲得路易十五首席畫師的稱號。晚年榮升皇家美術學院院長。

作為一個宮廷畫家，布歇創作了大量神話畫、牧歌畫和風俗畫。他對人生充滿豪情，作品洋溢著朝氣和陽光，筆下的人物也都是社會的幸運者。布歇喜歡神話和寓言，他創作了不少迎合人們趣味的藝術形象，如略帶輕浮的維納斯和可愛歡樂的小天使等。而《維納斯的勝利》、《維納斯梳妝》和《浴後的狄安娜》更是布歇神話題材作品中的精彩之作。

布歇不是一個肖像畫家，但他卻留下了一幅極為精美的肖像作品《蓬巴杜夫人肖像》。同時，布歇還創作了不少風景畫，著名的作品有《博書附近的風景》等。他受中國風影響，專門設計了一套題為“中國主題”的壁毯。布歇在他繪畫作品中表現中國市集、宮廷宴會、音樂、舞蹈和雜耍等等，洋溢出濃重的中國趣味。

此外，這次參展的近代歐洲中國風《帝皇之旅》掛毯(約 1700-1720)，也是“中國風”的代表作。這幅手工精美的近代歐洲中國風掛毯《帝皇之旅》(The Emperor on a Journey)為路易十四博韋生產，由 Guy Vernansal、Jean-Baptiste Belin de Fontenay 及 Jean-Baptiste Monnoyer 聯手創作。掛毯描述了十五和十六世紀傳教士東遊中國的見聞，其構圖描繪了皇帝莊嚴優雅地坐在裝有寶塔形蓋頂的豪華大轎內。於 18 世紀初，《帝皇之旅》掛毯以羊毛和絲綢混合編織而成，是《中國帝皇史》(l'Histoir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系列的作品之一。

受中國藝術的影響，當時的皇宮貴族及富貴之家，都喜用中國式壁紙裝飾房間，室內陳設中國漆器家具與瓷器，也成為人們的時尚。法國之外，英國、德國、奧地利等國的宮廷裏都有大量的中國工藝品，至今仍存放在這些宮殿和博物館裏供人們觀賞，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在園林藝術方面，中國的影響在英國的“中國式公園”上表現得最為淋漓盡致。傳教士王致誠盛讚中國圓明園的書札《中國皇帝游宮寫照》(1743 年)(1752 年英文節譯後改為《中國皇帝的北京園林》)在西方不脛而走，正好為歐洲崇尚自然、追求“不規則之美”的新園林運動推波助瀾。當時甚至出現了一些探討中國園林設計的專門書籍，如《中國式田園建築》、《中國建築和哥德式建築》、《新設計二十例》、《中國設計新圖冊》等。而具體的園林建築，要以位於倫敦西郊的丘園(Kew Garden)最具代表性。

丘園的設計師是英國皇家建築師、《中國房屋、家具、服飾、機械和家庭用具設計圖冊》(1757 年)一書的作者錢伯斯(William Chambers)。錢伯斯曾到過中國，他設計的丘園，模仿中國式庭園風格，於園內設置人工湖和假山，綴以曲徑、涼亭。特別是湖畔高達 10 層的八角形中國塔，有 163 英尺，塔的八角綴有 80 條小龍，龍口含著銀鈴；塔的旁邊有孔廟一座，上繪儒家教義，具有濃郁的中國風格。德國基爾大學的一位美學教授當時就稱此園“一灣流水，小丘聳然，灌林叢生，綠草滿徑，林樹成竹，盎然悅目”。錢伯斯由於此園的建築也聲譽日隆，他於 1772 年出版的《東方園林概論》，進一步表達了他對中國園藝師的讚美和對東方園林的崇尚。

中國的轎子也在 17 世紀首次傳入歐洲。歐洲王公貴族從中國學得按轎子的顏色和形制區分等級的制度。1727 年維也納出現首次按等級轎列出巡大典，德國皇帝乘坐特別華麗的轎子走在前列，後面是宮廷和樞密院的轎子魚貫而行。王公貴族、官吏乘轎的風氣在德、奧兩國一直延續到 19 世紀中葉。

四、結束語 — 回到歷史現場的中國意境

“梨花園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宋代大作家晏殊的名句，十分準確地表達了“中國風”的詩情畫意，三百年前在歐洲得到了共鳴，中國人深感榮幸和自豪。

由於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在中國親身經歷的報告和澳門港口聯接東西方經貿、文化的加強，18 世紀的歐洲以法國為主興起了一股“中國風”。在西方文化於明末清初大量傳入中國的同時，中國文化對啓蒙時代的歐洲社會生活和思想文化都產生了重大影響。當時“東學西漸”的衝擊甚至比“西學東漸”的影響還要強大，它構成了近現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道華麗的風景線。

2013 年 5 月 25 日—8 月 18 日，我們在澳門舉辦《象映乾坤——中國風》展覽，巴黎裝飾藝術博物館、羅浮宮博物館、塞夫勒國立陶瓷博物館、貝桑松考古美術館，以及永利渡假村(澳門)股份有限公司和 Johnathan Wattis 先生慷慨借出展品，與澳門博物館攜手合作，再現世界藝術史上輝煌的一頁，也為我們提供了學習世界美術史的最佳機會。使我們穿越時光隧道，回到歷史現場，陶醉在中國風的詩情畫意之中。重溫 17、18 世紀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有重大的意義——“回顧是爲了前瞻”，澳門將爲中西文化交流作出更大的貢獻。

註釋：

1. 引自《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五輯，第 13 頁，全漢昇論文，張彬村、劉石吉主編，中央研究院出版。
2. 以上資料均引自《澳門港史料匯編》第 79-81 頁，鄧開頌、黃啓臣主編，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3. 引自《白銀資本》[德]貢德·弗蘭克著，劉北成譯，208 頁，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
4. 參閱王景聖譯《殷宏緒關於景德鎮的兩封信》，載景德鎮市陶瓷館《陶瓷資料》1978 年，第一期，顏石麟《殷宏緒和景德鎮瓷器》，載《景德鎮陶瓷》1986 年第 4 期。
5. 引自《全彩西方繪畫藝術史》第 158 頁，主編汝信，編著王紅媛，寧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2013 年 3 月 15 日初稿於文化局澳門博物館

2013 年 3 月 18 日二稿於澳門—珠海灣仔工作室